

冯仲平等◎著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Zhongguogudai xiaoshuolilun
Mingjiayanyiu

名家研究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Zhongguogudaixiaoshuolilun
Mingjiayanjiu

名家研究

冯仲平等◎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名家研究 / 冯仲平等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5633-9341-1

I. 中… II. 冯…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482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6.75 字数: 390 千字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1 200 册 定价: 3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中国传统文论的构成形态是集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文论本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二者，一是对具体文学对象的分析、研究、评价，称文学评论，一是对理论问题的探讨与论证，称文学理论。西方文论，评论归评论，理论归理论，二者之间的界线较为明晰，而中国传统文论则不同。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认为，西洋文论“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中国传统文论不“偏于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而是“偏于文学理论”，“对于文学理论则比较热烈”。但很多人又认为情况不是如此，他们认为传统文论确是五光十色，但却不那么纯粹或专门。所谓不纯粹，是说传统文论提出文学问题时，理性色彩并不浓厚，理论不怎么样理论，就美学而言，他们认为西方美学偏于理论形态，具有分析性和系统性，而中国美学则偏于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如朱立元《走自己的路》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这是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西方人更是如此看待中国传统文论，鲍桑葵《美学史》说：“许多读者也许会抱怨本书几乎完全没有直接提到东方艺术，不论是古代世界的东方艺术也好，还是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东方艺术也好……因为就我所知，这种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他又说：“中国和日本的艺术之所以同进步种族的生活相隔绝，之所以没有关于美的思辨理论，肯定同莫里斯先生所提出的这种艺术的非结构性有必然的基本联系。”既不偏重于裁判、评论，又不偏重于思辨、理论，于是人们提出传统文论的形态特点是评论与理论的融合，如张伯伟《中国诗学研究》说起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中国古代文论，很少作抽象的纯理论的说明。批评家总是将理论批评贯彻于实际批评之中的。指导创作实践，总结创作经验，纠正不良文风，是古代文论著作所担负的主要任务。”他在评论与理论之外又加上创作，评论、理论和创作是传统文论的三大构成要素，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批评家提出一种理论，并不对它作抽象的纯理性的说明，而是把它贯彻于实际的作品评论、作家评论之中；实际的评论也不单单是裁判式的判断，而是为了指导创作，纠正不良文风，同时也是为了提高创作水平，于是，在裁判式的判断中，提出仍属于理论性质的几条原则来。如就两汉文论来说，基本理论原则是文学服从于政治、教化，批评对象是作品的

题材内容,通过批评方法的运用要弄清作品说了些什么,以政治生活印证作品或以作品印证政治生活,其目的就是对作品作出政治教化的评判,并期望通过批评活动来确定文学创作的方向,即文学服从于政治生活的理论要求,而创作又反过来印证其理论要求,符合其评论标准。

从文本形式上说,我国古代又出现了能够将评论、理论、创作融为一体的文学批评,最早有以诗论诗,还有以赋论赋,以词论词,以曲论曲以及以诗词论书、论画、论印等,又有诸如诗话、词话者,总之,是以文学作品的文本形式评论文学作品,评论中又展现着某种理论内涵。宋以后有小说评点这种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就是这样的将评论、理论、创作融为一体的文学批评;这样的三位一体又体现在出版的书籍印行上,批评家把自己的读书心得批在所读的作品中,而出版商在书籍印行中,把小说和评点即文学作品与批评合在一起呈现给读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文化传播和文化普及行为。

张潮《虞初新志·凡例》谈到了这种评点式的文学批评的适志性:“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或评其事而慷慨激昂,或赏其文而咨嗟唱叹。敢谓发明,聊抒兴趣,既自怡悦,愿共讨论。”《论语·阳货》记载孔子提倡读诗,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于是他提出“小子何莫学夫诗”的建议。这是孔子的生活情趣,他提倡一种适性的生活,不仅道德修养要好,还要有情趣修养,所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道家则将生活审美化与诗意化,去除功利之心,回归天地自然,其适性的最高境界是返璞归真。儒道二家哲学的适志性,成为古代批评家以适志态度来从事文学批评事业的哲学基础,这就使他们把文学批评事业当作赏心乐事,创造出许多赏心悦目的文学批评著作来。小说评点就是这种赏心悦目的文学批评的佼佼者。

仲平先生从南宁送来书稿《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名家研究》,书稿中所论小说理论名家,大都是以评点形式实施其小说批评的,于是写下了上面这些关于小说评点的感想。仲平先生做学问的特点,一是以文艺学出身的理论功底从事古代文学研究,那他研究理论、批评、创作三位一体的传统文论,自然更得心应手;二是他擅长组织研究生一起做研究,书稿中的好几个章节,就是他指导的研究生所做,而仲平先生自己所做的“金圣叹《水浒》评点”、“张竹坡《金瓶梅》评点”,自然就有一种示范意味。我从事研究生教育的管理工作多年,自己也指导有硕士研究生,无论从小范围还是从大范围讲,都觉得仲平先生这种研究生指导方式很好,很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其一,注重言传身教,导师是怎么做的,学生尽可以之为榜样;当然,如果另有发明,那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其二,我们总是说学科发展要培育一种学术传统,学术传统或为内在的,或为外在的,导师与学生一起从事某一共同领域的研究,这样做来虽然只可说是在培育一种外在的学术传统,但可以促进对内在学术传统的形成。其三是导师与学生一起从事某一共同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又是可分可合的,可聚可散的,独立来说,是学生的硕士论文,聚合而言,则是某种科研集体的合作成果,而最终以集体成果的方式推向社会,在社会上产生影响。仅就提携年轻人而言,就功莫大焉!

本书的作者,除了仲平先生外,其余六位都是他的研究生。李化来是广西师范大学2003级文艺学专业研究生,他写的第三章重点探讨了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的叙事结构艺术,从结构的形态特征、具体方法、美学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阐述了毛氏叙事结构理论比较系统的框架,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车瑞是仲平先生在广西民族大学带的第一届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审美文化,应届毕业生考入山东大学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她写的第七章侧重以现代美学思想阐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对脂砚斋《红楼梦》评点从陌生化、反讽、召唤结构三个层面进行了研究,在揭示脂评的美学意蕴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曹成竹是仲平先生在广西民族大学带的第二届少数民族审美文化方向研究生,应届毕业生考入南京大学攻读文艺学专业博士学位。他写的第五章重点探讨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追忆批评,在确定冯镇峦小说评点的历史坐标、挖掘冯镇峦评点的理论内涵与深入揭示其文化价值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廖华、张玉华、李美乐均是广西民族大学首次招收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她们于2009年应届毕业生分别考入暨南大学、广西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张玉华写的第一章从小说评点的解读方式、美学突破和历史作用三个层面揭示了李贽小说理论的重要价值,李美乐写的第六章从文本特征、文法结构、视角艺术和叙事意象四个层面探讨了但明伦小说评点的叙事理论成就,廖华写的第八章则从观念的突破、学科性批评理论的奠基与传播理念的建构三个方面勾勒了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总体风貌,均具有比较明显的创新之处。

广西民族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发展很快,作为兄弟单位的同一学科,我们很高兴能与广西民族大学的同行们携手前进,共同进步!如今读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名家研究》,看到仲平先生与他的学生们在学术研究上扎实的脚步,岂敢言序,只是谈谈自己的感想而已。

胡大雷

2010年2月12日于桂林

目 录

绪 言 / 001

第一章 李贽《水浒传》评点的现代阐释 / 003

引 言 / 003

第一节 李贽的小说解读方式——误读 / 007

一、发愤著书 / 007

二、忠义在水浒 / 010

三、大力大贤之人 / 013

第二节 李贽小说理论的艺术创新和美学突破 / 015

一、艺术创新 / 016

二、美学突破 / 019

第三节 李贽小说理论的历史作用与当代意义 / 022

一、历史作用 / 022

二、当代意义 / 024

结 语 / 026

参考文献 / 027

第二章 金圣叹《水浒传》评点的理论价值 / 029

引 言 / 029

第一节 “因文生事”与文本虚幻特性的深层奠基 / 031

一、史书“以文运事”与小说重构历史 / 031

二、《水浒传》“因文生事”与小说的本质特性	/ 032
三、小说胜似《史记》与艺术的精神超越	/ 034
第二节 “因缘生法”与创作根本规律的深刻揭示	/ 035
一、“因缘生法”是情节构造的逻辑依据	/ 035
二、“格物”、“忠恕”是创作的标准与尺度	/ 037
三、“亲动心”与“设身处地”是创作的成功秘诀	/ 038
第三节 “一心所运”与性格理论的深入聚焦	/ 040
一、人物性格是小说艺术价值内容的主要构成	/ 040
二、人物形象个性化是性格元素的合理配置	/ 042
三、“一心所运”是塑造人物性格的不二法门	/ 043
第四节 法度“精严”是小说结构的根本原则	/ 044
一、“句法”、“字法”是文法的表层结构	/ 045
二、“章法”是小说情节的连缀方法	/ 048
三、“部法”是小说的宏观结构艺术	/ 051
结 语	/ 053
参考文献	/ 054

第三章 毛氏父子《三国演义》评点的叙事结构艺术 / 056

引 言	/ 056
第一节 结构之相	/ 060
一、结构释义	/ 060
二、结构之相	/ 064
第二节 结构之法	/ 075
一、叙事时空	/ 075
二、叙事笔法	/ 080
第三节 结构之美	/ 084
一、和谐之美	/ 084
二、曲折之美	/ 085
三、对偶之美	/ 086
四、变幻之美	/ 086

结 语 / 087

参考文献 / 088

第四章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的理论系统 / 091

引 言 / 091

第一节 现实主义小说观 / 091

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 / 092

二、非淫书论 / 093

三、影射、实录与小说 / 095

第二节 创作与批评动力论 / 097

一、泄愤说 / 097

二、惩戒说 / 099

三、批评动力论 / 101

第三节 艺术与现实关系论 / 102

一、“入世最深”、“一心所通”与“现身”说法 / 103

二、小说、生活与“冷热金针” / 103

三、“假捏”、“幻造”与艺术真实 / 104

第四节 人物性格典型论 / 105

一、性格与情理 / 106

二、性格系统观 / 107

三、性格与环境 / 108

四、情节与章法 / 109

第五节 小说艺术欣赏论 / 112

一、审美整体观 / 112

二、审美倾向论 / 113

三、审美趣味论 / 114

四、审美快感论 / 115

结 语 / 117

参考文献 / 120

第五章 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追忆批评 / 121

引 言 / 121

第一节 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历史坐标 / 122

一、从《聊斋志异》四家评点谈起 / 122

二、冯镇峦及《聊斋志异》评点概况 / 126

三、冯镇峦评点的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 / 127

第二节 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内涵 / 129

一、“有意作文”的评点立场 / 130

二、作品—历史的宏观视角 / 132

三、特点鲜明的评点方法 / 135

第三节 冯镇峦《聊斋志异》评点的文化价值 / 140

一、文本维度：文化传承与秩序表征 / 141

二、文人维度：立言不朽与价值寄托 / 145

结 语 / 149

参考文献 / 150

第六章 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叙事理论 / 151

引 言 / 151

第一节 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文本特征 / 151

一、但明伦与《聊斋志异》评点 / 151

二、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基本内容 / 154

三、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构成 / 158

第二节 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文法结构 / 160

一、篇法严密，不漏一丝 / 161

二、文之妙，当于抑扬对待中求之 / 165

第三节 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视角艺术 / 170

一、作品的基本叙事立场 / 172

二、叙事者的全知视角 / 174

三、人物视角的限知叙述 / 178

第四节 但明伦《聊斋志异》评点的叙事意象 / 181

一、自然意象的人间意味和诗学情趣 / 182

二、社会意象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 184

三、精神意象的隐喻手段和文化联想 / 188

结 语 / 192

参考文献 / 193

第七章 脂砚斋《红楼梦》评点的现代阐释 / 195

引 言 / 195

第一节 追求至理至情的陌生化效果 / 197

一、以新颖之笔别开生面 / 197

二、深察情理以写奇妙之文 / 201

第二节 营造对比强烈的反讽意趣 / 203

一、借助语言反讽表达褒贬倾向 / 204

二、通过命运反讽暗喻人生哲理 / 206

三、设置情节反讽揭示社会规律 / 208

第三节 制造文本空白形成召唤结构 / 211

一、以“不写之写”漏泄隐微 / 212

二、以“云龙显影”毕现神情 / 213

结 语 / 216

参考文献 / 216

第八章 梁启超小说理论价值探究 / 218

引 言 / 218

第一节 小说观念的突破 / 220

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文学地位中心化 / 220

二、“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社会功用现代化 / 223

三、“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艺术特征理论化 / 226

第二节 学科性小说批评理论的奠基 / 229

一、批评形态——专题论文 / 229

二、批评话语——中西化合 / 232

三、研究方法——学科综合 / 234

第三节 小说传播理念的构建 / 237

一、梁启超的小说传播理念 / 238

二、梁启超小说传播理念的具体实践 / 240

三、梁启超小说传播理念的影响与启示 / 244

结 语 / 248

参考文献 / 249

后 记 / 254

绪 言

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三者总是相伴耦合而生,或同时并存,或先后相继,或相互引发,呈现出相互催生、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复杂生态。小说创作、小说批评与小说理论的关系亦复如是。中国古代的“小说”创作,即从“街谈巷语”发轫,而关于此所谓“小说”的批评与理论,亦复由此发轫。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作品,则从六朝志怪、志人,中经唐宋传奇、宋元话本等形式的不断演变,而终至于明清时期的鸿篇巨制而蔚为大观。小说批评与小说理论的发展演变,则正是在小说创作空前繁荣时期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

从李贽、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到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从张竹坡评点《金瓶梅》到冯镇峦、但明伦评点《聊斋志异》,再到脂砚斋评点《红楼梦》,而终至于近代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形成了既关注小说的社会功能,又注重小说审美特性的鲜明特色。小说批评与理论紧密依附并结合具体作品进行阐发,由外表松散、缺乏显性体系的评点形式,最终走上了系统研究的理论形态,显示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总体特性与发展趋势。从具体的个案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索每一理论家或论著的根本特性,同时也正是通过众多具体个案研究而展示整个理论发展史的线索与宏观面貌,并为深入探索中国古代小说和理论批评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坚实的基础。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名家的研究视野、理论内涵与角度侧重,基本包容了小说理论与批评的所有层面,有的强调小说创作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特别关注作家创作与批评的动力机制,着力发掘小说作品的情感价值和伦理意义,如李贽与张竹坡。有的强调小说创作的本质特性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系,特别关注作品的审美特性与艺术规律,集中发掘小说作品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宝贵经验,如金圣叹与毛氏父子。有的强调小说创作与立言不朽之人生价值寄托的关系,特别关注作家创作表征传统文化秩序的功能,深入发掘小说作品所承载的巨大文化价值,如冯镇峦与但明伦。有的强调小说情节发展与人物性格、行为情理的探讨,分析春秋笔法与反讽手法的运用,努力发明文本空白对于表达作者言外意旨的作用,如脂砚斋等。有的注重小说作品叙事理论、叙事结构与叙事意象的研究,如毛氏父子与但明伦等。除了具体的研究侧重与独特的理论视角之外,理论家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则是叙

事文学的人物性格理论,如李贽、金圣叹、张竹坡等,均将小说塑造的典型形象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通过不同层面的系统研究,形成了独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典型性格理论。而伴随着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小说理论不可避免地朝着新的方向演变,近代梁启超突破了旧的小说观念,确立了小说在文学领域的中心地位与变革社会的特殊职能,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与理论模式,构建了新的传播理念,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小说创作、批评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繁荣。

明清暨近代的小说理论名家,犹如闪烁在艺术天空中的耀眼星辰,共同组成了中国小说理论的繁盛局面;而这些名家们的小说评点作品,又如奏响在艺术殿堂中的优美旋律,共同谱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宏伟交响。

第一章 李贽《水浒传》评点的现代阐释

引言

李贽,明代万历年间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贽穷尽一生,为后世留下了不竭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影响巨大的“童心说”以及《焚书》、《藏书》和一些戏剧小说评点。尤其是他评点的容与堂本《水浒传》,开启了明清小说评点的闸门,使小说评点如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无疑具有首开之功。

李贽(1527—1602),字宏甫,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福建泉州晋江人。他7岁跟随父亲读书,20岁后离开家乡自谋生活,26岁中了福建乡试举人,30岁才被选作河南辉县教谕,做了20多年小官,51岁时任云南姚安知府,54岁辞官,潜心问学。他先是和湖北黄安耿定理共同讲学,后耿定理去世,因与其兄耿定向不和,便离开黄安,到麻城外30里的龙潭芝佛院居住,过着居士式的隐逸治学生活。之后因与耿定向辩论,并把来往书札收入《焚书》发表,遭到驱逐和迫害。先是1591年,李贽出游黄鹤楼,遭到驱逐。接着是1596年,有人怂恿史巡道利用地方官的势力驱逐他,但没有成功。1600年,李贽在麻城龙潭遭到最严重的一次迫害是,他所住的寺院和佛塔被捣毁和焚烧。1601年,李贽避于北京附近的通州马经纶家。1602年,由于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李贽被下狱治罪,后自刎于狱中,时年75岁。

纵观李贽一生,坎坷之至。他早岁为生活奔波,无暇他顾,正直的品性又使他在官场屡屡受挫。他在《卓吾论略》中说:“居京邸,十阅月不得缺。囊尽垂,乃假馆授徒。”^①可见当时在北京待缺的境况十分狼狈。又在《焚书·豫约·感慨平生》中说:“余唯以不受管束之故,受此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为县博士,即与县令、提学触。为太学博士,即与祭酒、司业触。……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②并详尽地叙述了他在官场中的不得志。因此,摆脱烦琐的世俗生活和追求无限的自由成了他一生的最高理想。他喜欢庄子,最爱苏轼,希望达到“乘虚御风”、“物我两化”的境界。现实生活中的不如意,李贽只好用读书著书来弥补。他出入于儒释道三家,无书不读,无理不通,发挥自如,令人惊叹。他著《焚书》、《藏书》、《史纲评要》,评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

记》、《琵琶记》，在史著和小说戏剧评点中使他对自由的追求得到了满足，实现了对社会的强烈批判。怀林《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说：“盖和尚一肚皮不合时宜，而独《水浒传》足以发抒愤懑，故评之尤详。”^③此说虽无法确知是怀林语，但评述者也可堪称李贽知己。

现存《水浒传》诸版本中，主要有两种署名李贽：一是明容与堂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一是袁无涯刊本《出像评点忠义水浒传全传》（一名《李贽评忠义水浒传全传》）不分卷，一百二十回。容与堂刊本和袁无涯刊本哪个为真，历来研究者看法不一。鲁迅、胡适等人认为两个刊本都是伪托本，容肇祖、朱谦之、郁沅等人认为容与堂刊本和袁无涯刊本都是真的，郑振铎、肖伍、马蹄疾、朱恩彬则赞同容与堂刊本为真，戴望舒、王利器、欧阳代发则力辨袁无涯刊本为真，各家都引经据典，互相辩驳。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从大处着眼，全面考察。容与堂刊本和袁无涯刊本的评语几乎没有相同的字句，评点风格也不大相同，这说明两个刊本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要么两个刊本都为假，要么一真一假，两个刊本同为真的可能性极小。从李贽接触《水浒传》到去世，只有短短十年时间，这十年里他不断遭受假道学的迫害，颠沛流离，再加上年老多病，视力不好，看书不便，绝没有精力两次评点《水浒传》。既然署名为李贽评点，容与堂刊本和袁无涯刊本也必定与李贽有关系，两个刊本中必有一真。

首先，李贽评点过《水浒传》。李贽对《水浒传》极为重视，这可从他对“宇宙有五大部文章”的评语中看出。刊印于1590年左右的《焚书》，就收有《忠义水浒传序》，这说明李贽已经接触过此书，或许已经着手进行批评了。他在很多书信中，也提到过《水浒传》。《焚书增补二·复焦弱侯》详细记载了他向焦弱侯索书的事：“闻有《水浒传》，无念欲之，幸寄与之，虽非原本亦可；然非原本，真不中用矣。”^④在与焦弱侯的另一封信里，他提到自己评点《水浒传》的感受，“《水浒传》批点得甚快活人，《西厢》、《琵琶》涂抹改窜得更妙”^⑤，大有快意恩仇之感。这两件事出自李贽的私人信件，作假的可能性极小，可作为他批评《水浒传》的有力证据。再看李贽其他朋友如袁小修《游居柿录》卷九的记载：“记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评点。”^⑥这里，李贽在何时何地评点《水浒传》，以及由何人誊录都有明白的记载，更可说明他确实评点过《水浒传》。因此，这些不容置疑的资料都提示我们，李贽亲自评点过《水浒传》，而且评点得甚为得意。

其次，容与堂刊本《水浒传》似为李贽评本。据容与堂刊本《水浒传》卷首，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后有“庚戌仲夏”一语，晚明的庚戌年有两个，一为嘉靖二十九年，一为万历三十八年。此刊本刻于李贽死后，则这庚戌无疑是万历三十八年。容与堂刊本卷首又有题名为“小沙弥怀林”的“李卓吾批评《水浒传》述语”。怀林确有其人，《焚书》中有几篇都涉及此人，他是李贽的侍僧，且关系密切。怀林约于万历二十六年先于李贽而逝，李贽有《哭怀林》四首，其中有：“南来消息不堪闻，肠断龙堆日暮云”；“何当弃我先归去，化作楚云散作霞”；“梦中相见语依依，忘却从前抱病归”；“交情生死天来大，丝竹安能写此中”^⑦等句子，可知怀林是抱病南归，一去不返，李贽对他的死十分悲伤。容与堂刊本《水浒传》刊行之时，怀林已去世多年，不可能做什么述语。况开头“和尚自入龙湖以来，口不停诵手不停批者三十年，

而《水浒传》、《西厢记》尤其所不释手者也”^⑧。据容肇祖《李贽年谱》载，李贽寓居龙湖大约在万历十三年三月^⑨，距怀林去世没有几年，“口不停诵手不停批者三十年”无从谈起。述语后又有言：“本衙已精刻《黑旋风集》、《清风寨》将成矣。不日即公海内。附告。”^⑩其宣传意图十分明显，疑为商家伪作。这么一个漏洞百出的怀林述语，自然是容与堂刊本为真的硬伤。但考察明代作伪的时风和出版商对利润追逐的恶劣习气，我们不能把这些序跋和述语当作评判版本真伪的唯一标准，而应该加以全面考察。

袁宏道在《东西汉通俗演义序》中记载了如下事件：“里中有好读书者，缄默十年，忽一日拍案狂叫曰：‘异哉！卓吾老子吾师乎？’客惊问其故，曰：‘人言《水浒传》奇，果奇。予每拣十三经，或二十一史，一展卷，即忽忽欲睡去，未有若《水浒》之明白晓畅，语语家常，使我捧玩不能释手者也。若无卓老揭出一段精神，则作者与读者，千古俱成梦境。’”^⑪欧阳代发认为容与堂刊本刊刻于万历三十八年五月，袁宏道逝世于当年九月，容与堂刊本刊刻流传到“里人”之手里面再闻于袁宏道之耳，时间太紧迫了。^⑫其实，考察明代讲学问学之风的盛行以及师友之间书信来往的频繁，再加上时人对李贽书的追捧（“人争购之，吴下纸价几贵”^⑬），李贽评点《水浒传》刊刻后完全可能造成如此影响。况且袁宏道所说的“里人”，绝不会是一般的山野村夫，他至少有能力接触《水浒传》，有鉴赏力评价《水浒传》，并有传播力发扬《水浒传》。袁宏道的记载恰恰说明，容与堂刊本为李贽评本，且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从学术思想层面来说，容与堂刊本也符合李贽的哲学主张和文艺思想。李贽哲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存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⑭。童心是人最初的纯真的赤子之心，表现在文学上就是真情。他认为作家要写出真文学，就不能失却童心，“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作家真情的自然流露，“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非说不可，“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割欲杀，而终不忍藏之名山，投之水火”^⑮。在这里，李贽强调了创作必须有激愤之事的催发，有不吐不快的激情。因此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就提出了“发愤著书”说。“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⑯他认为作者“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施耐庵和罗贯中是借《水浒传》以泄其对社会的愤怒。而作为评点者的李贽，也借用了“发愤”说来宣泄他对社会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在这一点上，他与太史公司马迁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愤怒反映在具体的评点中，就是对真人真事的肯定和对假人假事、假道学的无情批判。他赞赏李逵、鲁智深、武松等真性情的英雄好汉，批判那些沽名钓誉的鄙儒和身无一技之长连强盗都做不了的俗儒，高度评价那些虽是琐事但却真实感人符合人情物理的小说情节，批评那些故弄玄虚违背常理作假骗人的情节为“不济”。他的这种精神，在容与堂刊本《水浒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这也是我们认为他评点容与堂刊本《水浒传》的一个证据。